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1011

伟大建党精神探源

李君

(江西师范大学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 江西 南昌 330000)

摘要: 伟大建党精神不是中共建党先驱们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建党之日突然产生的,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特定历史条件、时空范围内创党建党活动中孕育形成的革命理想、信念、情感、意志、品格的总称。伟大建党精神起源于十月革命开创的人类觉醒的伟大时代,溯源于五四爱国运动,发源于上海、北京等重要地区,来源于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相关的革命先驱们,根源于创党建党的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起源、时间溯源、空间发源、主体来源、实践根源的研究,弄清伟大建党精神具体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伟大建党精神; 历史起源; 空间发源; 主体来源; 实践根源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6)01-0087-08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 Jun

(Office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as neither inherent in the minds of its pioneers, nor did it materialize abruptly on the day of the Party's establishment. Rather, it is a holistic concept encompassing the revolutionary ideals, convictions, sentiments, will power, and character forged by the pioneers through their foundational activities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spatiotemporal conditions. Originating in the great era of human awakening sparked by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is spirit drew inspiration from the Fourth Patriotic Movement. It took shape in some key regions like Shanghai and Beijing. Deeply rooted in the practical endeavors of party building, it drew nourishment from the revolutionary pioneers who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PC. Conducting in-depth research into its temporal origins, historical traces, geographical emergence, human sources,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to clarify precisely where and how this spirit came into being—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Keywords: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historical origins; geographical origins; human sources; practical foundations

收稿日期: 2025-07-10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内容体系、理论特征与价值意义研究”(25ZXHYZ01)

作者简介: 李君, 女, 湖北襄阳人, 江西师范大学特约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历史,不仅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锻造史,而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及其锻造史上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源头和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首次正式提出“伟大建党精神”的概念,并科学揭示其历史起点、基本内涵与历史地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伟大建党精神命题提出5周年来临之际,深入开展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起源、时间溯源、空间发源、主体来源、实践根源等研究,弄清楚伟大建党精神具体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有助于全党自觉弘扬和践行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助于增强全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自觉和精神主动。

一、时代起源:十月革命的胜利推动了中国人的觉醒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意识、思维、精神、思想是与物质、自然界、存在相对应的范畴,都是人脑的机能,是对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能动反映。“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物的物质活动,与人物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 思维和意识“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精神源于社会存在,是一个人的内在思维、情感、意志及其行为的强大动力和外在表现;伟大建党精神源于人类觉醒的伟大时代,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铸就的革命理想、信念、情感、意志、气节、品格的总称。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4],中国人民伟大觉醒的年代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开启了人类觉醒的新时代,也推动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长期以来致力于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分子的伟大觉醒。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曙光和希望,开始把目光从欧美转向俄国,向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8年11月底,李大钊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演说中指出,一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创造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是不可抗拒的“世界的新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5]247-248} 同年12月初,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称俄国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里变动的显兆”,“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Bolshevism的精神,是“全世界人类融入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展望未来,“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5]246}

1919年4月,陈独秀在《纲常名教》的短文中声称:“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各国劳动界的势力》等文中,他开始改变对十月革命的看法,认为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自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后,欧洲劳农两界,忽生最大的觉悟,人人出力和资本家决斗。”“这种革命,在政治史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6]97-98}

1919年5月,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爱国热情,加深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痛恨与不满,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与巴黎和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19年7月、1920年9月,列宁领导的苏俄发表了两次对华宣言,声称废止沙皇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掠夺的中国领土及一切权益。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同情和向往俄国革命,在传播、研究马克

思主义过程中逐步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坚定走俄国革命道路的决心。毛泽东曾经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的面貌才发生根本性变化。“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7]1471}

在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和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人民伟大觉醒的产物，是世界历史新潮流发展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建党历程中，认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普遍真理，确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自觉担负起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并在实践中铸就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意志和崇高品格，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

二、时间溯源：五四运动造就了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必要条件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8]伟大建党精神不是中共先驱们大脑中固有的，而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其形成过程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相一致。中国共产党虽诞生于1921年7月，到次年7月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完成创建，但其历史起点却源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作了必要准备，奠定了重要基础。

首先，作为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迷梦，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在于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鸦片战争开始后，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从此，开始觉醒的中国仁人志士和先进分子为了摆脱民族蒙羞、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命运，走上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辛道路。从“师夷长技”、主张君主立宪、建立中华民国到拥护“德先生”“赛先生”，

“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7]1470-1471}。正当中国人民陷于迷茫、彷徨之际，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直接催生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开始摆脱改良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禁锢，重新审视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道路。例如，用“强力拥护公理”，创造“新时代的精神”^{[9]427}；“精神解放”^[10]是一切解放的基础；实行民众大联合，效仿俄国的十月革命；通过“阶级战争”的方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1]；“社会主义”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12]；等等。全然一新的思想观念开始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

其次，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开始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的主体来源。任何政党都是建立在一定阶级基础之上的，代表本阶级的利益。五四运动持续到1919年6月初。北京学生的罢课、抗争运动遭到反动军警的大规模逮捕和镇压，激起了全国各地学生的进一步抗议活动。在上海学生“沿街跪求”商人罢市之际，上海工人于6月5日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次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决定开展罢工、罢课、罢市。随后，“三罢”运动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区、150多个城市。工人阶级自发组织起来，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就显示了强大力量，成为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实现改造中国和社会的理想，开始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奠定了伟大建党精神主体形成的基础。

再次，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坚持真理、坚定理想信念”精神的形成创造了必要前提。马克思主义虽在五四运动前就开始在中国传播，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对其作了较为系统的传播，但对广大知识青年而言，当时对各种“主义”“思想”的认识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直到五四运动开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主义”的根本不同，产生了“竭力传播德谟克拉西”^[13]的思想自觉，兴起了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热潮。瞿秋白曾指出，

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之痛,“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五四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14]20}。可见,五四运动为促进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最后,五四运动中形成的“五四精神”,是推动中国先进分子创建共产党的强大动力,构成了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源头。五四学生运动,一开始就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运动期间,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和骨干分子遭军警殴打、逮捕甚至迫害,但学生抱定“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决心,表现出大无畏、不妥协的抗争精神。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的演讲中指出,与以往爱国主义运动所不同的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9]518}。实际上,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不仅在于“牺牲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还体现在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精神,特别是“民众大联合”的精神以及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中所表现出的历史主动精神。五四运动的胜利,是“五四精神”的胜利。“五四精神”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内容,成为激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创建共产党的原动力。

三、空间发源: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的主要城市和地区

中国共产党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孕育诞生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分散性的特点。从空间起源看,创建活动首先发起于上海、北京,随之扩展到湖北、湖南、山东、广东等省几个大城市以及旅法、旅日的学生和志士中。这些分散在不同地区、已经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分子,在创党建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气、神虽各有特点,但其共同的理想追求、使命担当、革命意志、为民情怀,构成伟大建党精神的空间来源。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中央机关所在地。1920年6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自己的寓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党组织,会议起草了党纲;8月,

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实际肩负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14]28}。在上海党组织的联络、指导和推动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法、旅日等地早期党组织纷纷建立。次年7月,上海党组织发起的中共一大在法租界望志路“李公馆”内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创建,到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上举行),历经艰难险阻,充满惊心动魄,在渔阳里、望志路—南湖红船等地孕育形成了以追求真理、敢为人先、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等为主要内容的创党建党精神。

北京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孕育地和重要起源地。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两人相约建党。3月,李大钊发起、成立全国第一个有组织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北京早期党团组织建立前后,直接派人到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开展工作,对全国建党并筹建北方党团组织发挥了重要推动和促进作用。在北大红楼等地孕育形成的为国为民、再造中华的初心使命,启迪思想、播撒火种的铁肩担当,坚持真理、牺牲奉献的精神追求,构成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来源。

除上海、北京外,湖北、湖南、山东、广东等地是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地方组织的重要省份。各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建党先驱们在建党活动中表现出各具特点又内在一致的建党精神。比如,董必武、恽代英等湖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分子,以两条不同路径先后开始了建党活动,孕育了“坚定信念、勇于担当、创新求变、不惧牺牲”^{[15]203}以及追求真理、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格;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湖南建党先驱们在建党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湖湘文化底蕴和特点的“求真务实、经世致用,服从真理、敢为人先,

勇猛精进、视死如归，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精神风范；王尽美、邓恩铭等济南建党先驱们在建党过程中体现出坚守初心、勇于担当、不畏险阻、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陈独秀、杨匏安、谭平山等广东建党先驱们在建党过程中彰显了坚持理想追求、践行初心使命、敢于奋斗牺牲、投身工人运动等革命精神。

此外，蔡和森、赵世炎、李立山等在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过程中体现出追求真理、勇于革新、不怕困难、团结奋斗的革命精神；施存统、彭湃等在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中彰显出“艰辛探索、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敢于斗争”^{[15]345-346}的精神。

上述省份或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发源地，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近代以来思想文化演进、经济社会状况紧密关联，与其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所处的地位、作用紧密相关。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及其建党形式，决定了各地孕育形成的建党精神各有特点又本质相通。它们共同构成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空间来源，综合汇聚成“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四、主体来源：直接和间接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先驱们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创造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6]同时，“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17]。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正是如此。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发挥了领袖和先锋队作用，但早期的青年团员和先进知识分子、觉醒起来的工人阶级等，也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贡献，他们都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体，也是孕育伟大建党精神的主体。

首先，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是创建中国共产党、孕育伟大建党精神的直接主体。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有党员50多人；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共195名^{[14]34-42}。其中，代表性人物包括：李大钊、陈独秀、董必武、毛泽东、王尽美、谭平山、李达、邓中夏、蔡和森、何叔衡、邓恩铭、张太雷、赵世炎、杨匏安、陈望道等。他们虽出生在不同地方、不同家庭，人生履历、成长轨迹不尽相同，但身上都蕴含着某些类似、共通、共有的精神品格。这主要体现在面对国家积贫积弱、人民受苦受难的现实，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救国救民抱负，具有探寻、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行动。五四运动前后，他们不约而同地从信奉各种“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从此，他们矢志不移，为了民族独立平等、人民自由解放，国而忘家，勇敢面对险恶政治环境，敢于斗争、不怕牺牲，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体现了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忠心。正是这些建党先驱们身上共同蕴含的精神特质，构成了“伟大建党精神”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主体来源。

其次，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孕育伟大建党精神的辅助主体。自1920年8月上海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2年5月止，全国地方青年团组织在曲折中发展壮大到17个，团员总数达五千人^{[18]70}。同时，赴欧勤工俭学的学生在巴黎建立了旅欧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18]74}。该组织对外宣称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因而早期党组织的很多不便公开的工作都是利用团组织及其机关报《先驱》开展的。青年团在共产党员俞秀松、施存统、赵世炎等领导下，以学习宣传社会主义、“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培养青年革命精神为己任，涌现出像任弼时、邓小平、萧劲光、李维汉、陈毅、毛泽覃、陈延年、于树德、李树彝、黄爱、庞仁桢等一大批优秀团员。其中，黄爱、庞仁桢在领导长沙华实沙厂工人罢工斗争中被军阀逮捕杀害，为了信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李大钊称他俩是“为他信仰的主义而死”，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18]59}。广大青年团员在“主义”纷呈的时代坚定选择社会主义，积极践行团

的宗旨,立志用新的方法改造社会,组织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冒着生命危险远赴苏俄求学,深入工厂开展社会调研、思想启蒙,领导工人罢工运动,彰显了坚守信仰、追求真理,践行初心、服务工农,敢于担当、不怕牺牲,开拓进取、一心向党的革命精神,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再次,觉醒了的工人阶级是奠定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孕育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主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19]只有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摆脱压迫和专制,把自己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有产业工人200万左右。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觉醒,由自在走向自为,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主力,体现了敢于斗争和牺牲奉献精神。随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从原来主要是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转到主要为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政治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工人阶级从香港海员罢工开始,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期间,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30万以上^{[14]45},涌现出苏兆征、林伟民、林祥谦、施洋、邓培、彭礼和、项德隆(项英)、史文斌、高斌等一大批工人运动领袖。“二七”惨案中,壮烈牺牲者58人,受伤者300余人,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20]。他们中除少数是党员、团员外,更多的是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为了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中国工人阶级表现出强烈的组织纪律观念、团结协作精神,彰显了彻底的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实践根源: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主要革命活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意识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存在的产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1]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伟大建党精神不是建党先驱们头脑中主观自生的东西,其根源于建党实践,并反作用于建党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先进知识分子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中共一大和二大的召开等直接相关,正是在这样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中孕育产生了伟大建党精神。

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的确立与坚守,根源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以及知识分子群体中发生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反复比较、论争和试错的过程中,逐步认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相继选择马克思主义,坚定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如,毛泽东在经历上海短暂实验工读互助生活的失败、湖南自治运动受挫后,认识到“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22],确立起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的信念。又如,周恩来曾回忆说:“我方到欧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到去年秋参完妥了我的目标”,即“C.ism”。从此,“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23]。

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担当精神,根源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建党先驱们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1919年5月初,当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立刻“直接行动”,掀起了一场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当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中看到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后,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深入工人群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一部分工人的阶级觉悟因此得到进一步提高,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此基础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决心通过创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社会”^{[18]486}。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致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2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积极探索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在中共二大会议上正式确立了党的

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明确当时党的奋斗目标是“对内‘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18]133}”。这一切充分彰显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精神品格。

敢于斗争、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根源于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建党先驱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赤色”革命，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秘密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等一系列革命活动。1919年6月初，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运动，激起了学生的愤慨，北京学生重新上街游行抗议，遭到军警的残酷迫害，陈独秀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也遭警察逮捕，但他们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9]424}。陈独秀获释后，行动仍受到监视和限制。他秘密离京抵达上海，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1920年1月，周恩来在领导天津学生抵制日货、向直隶公署请愿的斗争中遭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坚持向难友传播马克思主义，出狱后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身为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教授，每月薪水高达200元左右，但他将大部分收入均用于公益事业、接济贫寒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动，自己省吃俭用、家庭生活拮据。1921年7月，全国各地党小组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齐聚上海召开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正式诞生。正是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勇往奋进以赴之”“瘁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25]的理想追求、使命担当和牺牲奉献精神。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同样根源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创党建党的革命实践。知识分子在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对劳工阶级的深切同情和深厚情感，激发起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理想抱负。李大钊早在1919年春就揭示了唐山煤厂工人不如骡马的生活状况。1920年初，在李大钊的宣传鼓励下，北京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深入到人力车居住区开展社会调查。“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

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15]47}陈独秀通过调研，揭示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的悲惨命运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从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教育启发劳工阶级的思想觉悟、争取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不懈奋斗。中共一大作出了第一个决议，将成立产业工会作为“党的基本任务”，对在工人中开展政治思想宣传、创办工人学校、组织发动工人运动等工作作出了部署。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告成立，目的就是要把产业劳动者组织成为一个“有力的团体”，“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尤其是要“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18]46-49}。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共产党员、江岸地区罢工总负责人林祥谦，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刽子手的屠刀，坚持“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一批党员、团员在工人运动中英勇斗争、不怕牺牲，充分显示了他们对党和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不辜负劳苦大众殷切希望的精神风范。

此外，中华民族积淀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厚滋养。其中，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为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思想前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为早期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提供了精神支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为早期共产党人敢于牺牲的精神奠定了道德基础；心忧天下、精忠报国的民族气节为建党先驱们为国为民情怀的产生提供了心理动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0.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4.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39.
- [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2版.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68.
- [5]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6] 唐宝林，林茂生. 陈独秀年谱[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00.

- 版社, 1988.
-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03.
- [9] 陈独秀文章选编: 上[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84.
- [10]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73.
- [11] 湖南人民出版社. 蔡和森文集: 上[M]. 2版.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23.
- [12] 《李达文集》编辑组. 李达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42.
- [13]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5.
- [1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2.
- [15] 吴德刚, 伟大建党精神研究课题组. 伟大建党精神: 孕育与形成[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3.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605.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 第1卷[M]. 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6-27.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1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84.
- [20] 黄修荣, 黄黎.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M]. 北京: 青年出版社, 2014: 626-627.
- [2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1.
- [2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毛泽东年谱: 第1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70.
- [2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9.
- [24]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39.
- [25]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74.

责任编辑: 陈璐

(上接第79页) 尊重、对非工具性规则权威的持守及对政治权力限度的清晰阐释, 对当代中国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创新社会治理、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要的理论参照价值。它深刻提示, 良序政治离不开对规则本身的敬畏与对个体自主空间的维护。然则, 吾辈亦须清醒洞察其理论在拒斥实质性目标、文化适应性等方面的局限。中国独特的政治传统与转型期社会特质, 要求我们在汲取奥克肖特思想精华的同时, 有效回应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诉求, 审慎平衡个体活力与社会整合、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规则权威与治理效能之间的复杂张力。质言之, 奥克肖特之理论非为操作蓝图, 实乃激发吾辈立足本土实践、进行创造性理论探索的宝贵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 [1] 迈克尔·奥克肖特. 哈佛演讲录: 近代欧洲的道德与

- 政治[M]. 顾玫,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 [2] 保罗·弗朗哥. 欧克肖特导论[M]. 殷堂, 刘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3] SKJÖNSBERG M A X. Michael Oakeshott on Libertarianism, Conservatism, and the Freedom of the English[J]. *Cosmos Taxis*, 2022, 10(7/8): 7.
- [4] 迈克尔·欧克肖特.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 张汝伦,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5] 迈克尔·欧克肖特. 宗教、政治与道德生活[M]. 蒂莫·西富勒, 编. 张铭, 姚仁权,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125.
- [6] VAN KLINK B. The Rule of Law: Between Ideology and Utopia[M]//Utopian Thinking in Law, Politics,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2: 38-58.
- [7] OAKESHOTT M. On Human Conduct[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责任编辑: 陈璐